

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 (续)

韩嘉玲

在我们的学校问卷调查中, 15% 以上的学校都有搬迁的经历, 最多的曾更换了 4 次校址, 几乎每年搬迁一次。原因是随着学生的扩增及北京城市的扩建、改造、拆迁, 流动人口不断地向四环路之外迁徙, 主要以满足外来人口中的低收入人群的流动人口儿童的学校也四处漂泊, 而且有不断向外搬迁的趋势, 有的已经迁移到远郊区县如昌平、大兴等地。

最近由于北京申办奥运而带来的大规模改造、建设, 许多学校又面临前途未卜、何去何从的压力。特别是计划中的奥运村洼里一带, 如果今年 7 月奥运申办成功, 这个以河南人为主的社区将面临再次迁徙的命运。对生活在这个社区的流动人口而言, 当举国欢腾庆祝的时候, 他们将必需离开辛苦建立的家园, 重新在城市的边缘寻找新的落脚点。这个地区十余所学校的生存发展、分布与生源, 将完全改变。

(2) 学生流动

虽然流动人口的流动高峰时间一般都在春节前后, 基本符合学校的学期时间, 但是随着父母工作及住处的变动, 流动儿童的上学场所也随之经常变化。近年来随着外地人口在京收入趋势的下降, 有的家长因为找不到工作或经营不善而举家返乡, 在我们进行学生问卷调查的过程中, 当再返校核实时, 就发现上星期还在校的学生, 本周已经随父母回家或去其他城市了。此外, 如安徽来的小蓉原来在肖家河的希望小学四年级上学, 由于父母更换工作而搬到温泉, 新家离校较远, 她在学期中间就离开了希望小学。

一般刚开学时学生较少, 后来逐渐增多, 到年底随父母回老家时, 学校的学生也随之减少。特别是六年级的学生流动更严重, 因为在北京上初中的费用高昂, 那些要返乡继续升学的学生, 往往在六年级下学期前转回流入地 (详见表 1、表 2), 所以六年级学生明显减少。

在我们调查时许多学校的校长, 甚至部分班主任都说不准班上的学生数。而大部分的学校并没有学籍登记表, 更没有记录学生流动的资料, 使得我们对学生流动情况的调查非常困难。很幸运由于某所学校的教师工资与学生人数挂钩, 因此我们根据这所学校的教师工资表的记录整理出 1998 年 3 月—2000 年 1 月该校学生的变动状况。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学生的流动状况。以 1998 年下学期该校二三年级为例, 每个月都有学生转进或转出。

(3) 教师流动

流动儿童学校的教师来自全国各地, 由于教师工资较低 (大约每月 500 元人民币), 生活条件艰苦, 教学负担重, 此外, 部分校长不尊重教师 (详见下节), 因此只要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教师就常常跳槽另谋高就。在对 69 个班级的调查中, 发现近一半的班级在本学期 (2000 年度上学期) 都有中途更换教师的情况。可见教师的流动状况非常严重。教师如此频

繁流动对学生的学习与心理适应、教育与课堂管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和不良作用。这些儿童来到一个新城市多半面临环境的适应问题，而教师的频繁变动更增加了学生适应不良的状况。

表 1 某流动儿童学校各年级学生每月人数变化表（1998 年 3 月—12 月）

年 / 月份 年 级	1997—1998 年度下学期					1998—1999 年度上学期			
	98/ 3	98/ 4	98/ 5	98/ 6	98/ 7	98/ 9	98/ 10	98/ 11	98/ 12
学前班	40	43	44	40	40	60	69	60	58
一年级	8	9	9	9	9	66	74		38
二年级	43	44	43	41	38	46	46		44
三年级	29	30	33	34	33	49	49	49	49
四年级						59	65	58	59
五年级									
六年级	20	21	22	22	22	24	24	24	25
初一	28	31	32	32	31	20			
初二						41	43	43	43
初三									

表 2 某流动儿童学校各年级学生每月人数变化表（1999 年 3 月—2000 年 1 月）

年 / 月份 年 级	1998—1999 年度下学期				99/ 7	1999—2000 年度上学期				
	99/ 3	99/ 4	99/ 5	99/ 6		99/ 9	99/ 10	99/ 11	99/ 12	2000/ 1
学前班	55	65	65	56		66	73	71	71	54
一年级 1 班	31	35	35	36		70	70	71	67	67
一年级 2 班	26	32	30	26		—	—	—	—	—
二年级 1 班	45	46	46	42		67	65	66	66	45
二年级 2 班	47	51	52	51		42	40	41	41	37
三年级 1 班	72	76	73	70		—	—	—	—	—
三年级 2 班	—	—	—	—		48	48	48	48	45
四年级	70	74	72	69		86	86	86	86	77
五年级	53	50	50	49		73	71	72	70	66
六年级	19	19	20	21		—	—	—	—	—
初一 1 班	42	49	57	50		52	51	52	51	52

2. 边缘性

此处所指的边缘，除了上述该类学校由于办学条件、教学质量的“不规范”，还包括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制度排除斥及社会歧视所造成的边缘性。

流动儿童学校主要是面对流动人口中低收入人群的子女（有关家长的收入部分，详见学生该节），以及城市里的边缘儿童，如智力发展较慢，以及因为各种原因而未报上户口的“黑”孩子。

在我们调查的 50 所学校中，意外地发现 7 所学校有北京的孩子，他们系城市里的另一种边缘儿童。他们有的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有的是社会歧视而被排除出主流社会。

在学校（案例 50）二年级上学的洋洋，父母都有北京户口。他自小有自闭的倾向，一直到 4 岁才开始说话。到了上学的年龄，洋洋户口所在的学校是知识分子子女云集的重点小学，要进这所学校的人多得挤破头，找尽了关系还得缴数万元赞助费，才得以入学。洋洋的父母知道孩子一定会被学校拒绝入学，所以将洋洋送到了这所学校。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的调查中并不罕见。这种原本专供外来流动儿童上学的简易学校也给这些城市的边缘儿童提供了上学及发展的空间和场所，这是我们调查之初始料不及的。此中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现行的学校教育和教育体制是否应给予边缘孩子应有的教育和发展机会。

另外一种孩子就是父亲是北京人，母亲是外地人的子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发展，大量民工流入大城市工作与生活，然而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年轻女工与北京人结婚，成为所谓的“外嫁京”的打工妹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她们及她们的孩子的户口却无法进入北京，他们又不愿意在农村为孩子登记户口，这些孩子因此就成了没有户口的“黑”孩子。调查发现现在流动儿童学校中，有不少学生是属于母亲是“外嫁京”的子女。

3. “不规范”性

我们调查的 50 所学校，无一有合法的办学手续，部分学校取得了流出地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但都未经北京市教育局有关方面的认可，仍然没有办学的合法性。由于这些学校未经政府部门审批，所以不能提供学生毕业证。因此对多数家长来说，这类学校只是提供适龄儿童起码的认字、算数的扫盲功能，仅是提供儿童短暂的受教育场所。

此外，由于是非正规的地下学校，因此对于课程设置、作息安排、考试、学费、开学及放假的时间安排等等，都未依照教育部门所颁发的规定与标准实行。大都是由学校的创办人“自行决定”，因此校际间的办学条件、教学管理上差异很大。

三、流动儿童学校的师资及教学

（一）教师队伍

流动儿童学校草创之初，一般只开设低年级，教师大部分是创办人从老家找来的亲戚与朋友，他们不一定有教学经验。等到学校形成规模后，一般就向社会公开招聘，对学历及教学经验都有了一定的要求。有的学校负责人回老家聘请有经验的教师，也有的聘请北京当地的退休教师。大部分教师是女性，约占 70% 以上，这与传统认为女性较有耐心，更适合从事低年级的教学工作的职业分工性别定势有关，此外这类学校工资低（大约在每月 500 左右），也是女教师多的另一个原因。

这些教师中有教师资格的比例很低。他们有的是有几十年教龄的退休教师，也有从未有任何教学经验的来京打工者，其中大部分担任过农村民办及代课教师，由于无法转正及工资太低外出打工（各地不同，一般在 100 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公办教师也出来打工，这主要是由于当地政府拖欠教师工资或工资太低等原因。还有部分教师是地方的师范学校毕业后未分配的应届师范生，他们在农村凋敝的背景下，这群农村的知识分子，随着农民潮的涌出，也到大城市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机会。

这些教师来自全国各地，一般都有高中或中专学历，也有部分初中学历的。他们中还有大专及本科的打工者，然而却是最不稳定的一部分教师。对他们来说教书只是一个可以暂时

歇脚的权宜之计，只要找到更好的工作，随时就辞去教职。

这些教师的生活非常艰苦，外地来的老师，一般吃住都在学校，但多数学校所提供的教师宿舍都是非常简陋的，有的学校十几个人挤在不到 20 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张上下铺的床要挤 4 个人，有的学校甚至让老师晚上在教室搭个睡铺。而管理后勤的一般都是“校长”的亲戚，因此在“节省开销，以换取最大利润”的条件下，教师吃的也是非常简单，甚至有学校定下每天仅十元菜钱的戒规。

（二）教学

流动儿童学校的学生是城市中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跟随父母外出打工而辗转迁移，到适龄阶段由于没有流入地的城市户口，也缴纳不起高额的赞助费及借读费，而无法进入当地的正规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进入打工子弟学校是他们“自力救济”的无奈选择。由于父母辗转流动，他们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他们的学业也不同程度地被影响和耽误。

流动儿童学校的课堂教学与一般正规学校的教学有很大的差别，以下三点构成了流动儿童学校的特质。

1. 学生来源广

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农村及小城镇。上语文课时，学生口音多样，南腔北调。有的学生读课文，老师、同学都听不懂，全班笑成一团。因此老师还要纠正同学的口音，以学好普通话。但部分外地老教师讲话也带着浓厚的乡音，有时学生也难于适应。此外，由于区域差异，学生的风俗、习惯、观念不同，对待、处理事务的态度也不同，这都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2. 学生年龄及学业基础参差不齐

由于流动儿童学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在流出地上过学的学生，原本使用的教材有的是五年制，有的是六年制。流动儿童从老家出来时，一般也无转学证，不知他原来念到几年级，只有少数不愁生源的学校有入学考试（约 25%），其他的学校，只能听由家长自报学生程度。在同一班级中，学生年龄相差较大，一般差距在 3—5 岁。例如，有学生 16 岁才念小学四年级，也有 9 岁念初一的。不仅年龄差距大，学业基础更是参差不齐。如访谈案例中，就有没念过二年级而直接上三年级的学生，也有在流出地读五年级，到北京念四年级的情况。

此外，多数流出地的学校对教学抓的不紧，特别是刚开始习字时，不用田格本，字写得歪七扭八，有些学生从小没有养成正确的写字笔顺习惯，因此中高年级的老师还要重新教学生横、竖等基本笔画。教师改作业时更是要发挥想象力去猜学生写的错别字。如自丝（私），出（初）中等。

3. 学生流动性大

一般在寒假前的最后一个月，学生就纷纷回老家了，有的学生离开时，连声招呼也不打。过完春节学生才又陆续返回。由于工作不稳定而到处迁徙，学生也只能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有的班级几乎每个月都有转进的新学生。有的学生在学年的下学期才从老家来北京，到了学校学习又跟不上。对于这样的学生，有的老师不讳言地说：“大部分情况下，也只能布置作业让学生自学，能跟上就跟。”只有少数认真的老师才会给新来的学生补课，这些又都增加了教师教学的困难与负担。

如何针对流动儿童学生的上述特点，探索符合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的教学模式，是教育科研部门应努力的方向之一。

(三) 师生关系

虽然流动儿童学校的部分教师并无教学经验,教师中有教师资格的比例亦不高,但从问卷及访谈的调查显示,他们并不如想像般的只是滥竽充数而已。流动儿童学校教师无论在教学上或对学生的关心程度上,大部分都能获得家长及学生的认可。有 61.2% 的学生“喜欢”现在学校的老师,仅有 1.9% 的学生表示“不喜欢”学校的教师; 31.5% 的学生表示“有的老师喜欢,有的不喜欢”。此外,针对教师的教学水平,以流动儿童学校教师与流出地教师相比较,46.7% 的学生认为“比流出地学校教得好”,只有 7.4% 的学生认为“比老家差”。

这批从农村来北京打工的老师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以微薄的待遇,却付出了一般教师双倍的劳动,为国家培育了成千上万原本可能流落街头的孩子。

四、流动儿童学校的学生

(一) 学生的组成: 阶层、性别、民族及籍贯

阶层

流动人口中的白领阶层及中高收入者,一般都把孩子送入北京的公办学校或者私立“贵族”学校。流动儿童学校基本上主要是面向城市流动人口的中低收入者。

流动儿童学校学生的家长一般多为小商贩,以卖蔬菜、水果的个体小商贩(40.7%)、保洁或废品收购者(5.7%)、种地人(4.4%)等为主,无论从家长问卷或学生问卷有关收入的调查数据,都显示每户每月 1000 元收入是较普遍的情况。其中收入在 500 元以下的占 20.2%, 501—800 元的占 16.1%, 801—1000 元的占 27.1%, 2001 元以上的占 14.1%, 一些家庭(6.3%)的收入在 5000 元以上。

根据我市颁发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北京市民政局于 2000 年 7 月开始实行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是家庭人均月收入 280 元。一般外地人口中,两个孩子的比例最高为 54.8%, 其次是三个孩子占 23.6%, 一个孩子的家庭占 16.1%, 四个孩子的占 4.1%。调查中最多的有七或八个孩子的。如果以此为参照标准,我们以四口之家为标准来估计,家庭月均收入 1000 元就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因此我们调查的学生多半来自贫困家庭。

此外,一般情况下,能将孩子带出来的家长多半是在城市里占稳脚根的家长。但从本次调查来看,父母与子女同时出来的比例也不少,约占 9.6%。

性别

根据本次问卷调查的学生总数可看出,女学生仅占调查学生总数的 42.8%,这说明流动儿童少年在就学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课题初始阶段,我们推断有以下几种可能:(1)把女儿留在老家;(2)女儿辍学在家。

根据上述推断的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家庭(2157 户)中的 6—15 岁适龄儿童,留在老家的男童只有 7%,而把女童留在老家的比例占 12.2%。显然女童比男童的比例高 5.3%。其原因主要是受女儿更乖、更听话等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此外,北京流动学校的学杂费虽然较公立学校便宜,仍然较农村学校为高。在本次调查中 73.1% 的学生回答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学杂费高于老家,这也是家长将女孩子留在老家上学的原因之一。

然而根据我们进一步对流动人口家庭子女的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在调查的 2157 个儿童的兄弟姐妹中,共有 3864 名适龄儿童(6—15 岁),他们的性别比是(125:100)。因此女学生在校比例低于男学生的性别差异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所导致。由于传

统的重男轻女观念残余及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使得许多孕妇特别是农村妇女在怀孕初期进行B超检查，发现是女婴往往采取打胎。

从以上的论述，可见在流动儿童少年学校，女学生在校比例低于男学生的，主要原因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其次是将女童留在老家上学，而女童辍学或失学在家的比例并不高。这或许和流动人口出外打工后，干的都是苦活、累活，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对子女的教育较重视有关。

此外，在访谈的个案中，发现有的父母让儿子念公立学校，而让女儿读学费较低的流动儿童学校的情况。除了性别差异外，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因素，由于这些家长实在无法负担双倍高额的借读费与赞助费，他们只能选择培养对家庭发展更有用、更有利的男孩。

民族

在本次调查中，汉族占99%，少数民族仅占1%，这与流动人口中的少数民族比例偏低及分布地区等因素相关。

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主持的“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及全国总工会主持的“1997年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都缺乏少数民族外来人口的数据。根据《1994年北京市流动人口调查资料》中的民族状况，其中汉族占96.78%，少数民族仅有3.22%。因此，本市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第二代也较少。

籍贯

学生来自五湖四海，除了没有来自西藏、青海、新疆及上海等地，学生几乎囊括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又以河南（25.7%）、安徽（17.7%）、湖北（14.6%）、河北（12.7%）及四川（6.5%）为主要来源，这基本上与在北京的流动人口主要来源吻合。由于北京流动人口一般呈现地域聚居的现象，所以在调查中湖北的比例略高于河北的原因，可能与调查学校的选样地点有关。

（二）同学关系

虽然在选择学校的时候，部分家长把流出地老乡所办的学校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是学生在学校时，并没有因为地域的关系而影响与其他同学的交往。61.8%的学生，选择喜欢与老乡及其他省份的同学一起玩；16.9%的学生喜欢和其他省份的同学一起玩；只有15.7%的孩子喜欢和老家来的同学一起玩。此外，有不少学生认为他们喜欢北京生活的原因之一，就是可以与不同省份的同学交往。

在课余，他们自创的主要游戏，就是跟其他省份的同学互相猜测和学习对方的语言。他们可以侃侃而谈，告诉你四川人爱吃辣的；我们老家的年糕与其他省份的做法不一样；南方的粽子里面有甜馅或咸馅，北方的粽子是大枣等。课间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互相比较自己老家与同学老家的气候、动植物、语言、饮食及生活习惯。

总之，这类学校让学生们认识了来自祖国各地的小朋友，并让他们彼此结下了良好的友谊。在这样的学校里没有歧视、充满了温暖。一位智力发展较慢的北京儿童的母亲认为，她的孩子在这里找到了学习、生活的空间，她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在这群孩子，而不是城市里重点学校的孩子。”

（三）亲子关系

流动儿童的家长整日忙于打工、经商，没有时间与精力过问孩子的学习，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空白的状态，绝大部分的家长虽然非常关心孩子，但他们每天起早摸黑地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孩子的学习，只有 26% 的家长“经常检查学生的作业”，57.2% 的家长“有时检查学生的作业”，16.8% 的家长“从不检查学生的作业”。而有 29.4% 的学生“在作业不会的时候会去问父母”。

在孩子过生日或六一儿童节时，家长带孩子出去玩的比例也不高，为 15.4%，主要因为父母的工作情况，很难有时间陪伴孩子去玩。

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放学后，父母并不在家。他们或是与兄弟姐妹在家（35%）或一个人在家（17.3%）。他们的父母回到家一般都要在晚上 7、8 点钟，因此子女往往都要承担家务，有的孩子需自己做饭吃。

由于父母工作忙，孩子承担了部分的家务劳动。42.3% 的孩子“经常帮”父母干家务，53.1% 的孩子“有时帮”父母干家务，只有 4.4% 的孩子“从来不帮”父母干家务。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一般是半小时至一小时左右。

他们最常干的家务是洗碗（74.4%）、洗菜（61.3%）、提水（55.1%）、扫地（45.3%）、做饭（45.2%）和洗衣服（42.1%）。

由于外来人口中的中低收入者一般都住在民房及专为外地人所盖的简易平房，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里除了床铺，就是吃饭的桌子、必备的锅碗瓢盆及简单的家具了。因此，一般屋里没有自来水，而是院里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所以一半以上的孩子，都有提水的经验，还有 1/4（25.5%）的学生在课余有帮助父母工作的经验。确实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四）与社区的关系

本次调查的流动儿童少年（8—17 岁）中有 5.0% 是在北京出生的，其中 17.7% 的孩子在北京上过 5 年学，36.1% 的孩子 5 年前就来过北京。他们当中有不少孩子基本上在北京度过他们的童年时代，甚至个别的孩子已经说不清自己是那里的人。有 10.0% 的孩子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尽管他们没有北京户口。然而北京是他们生长的地方，哪怕是在城市边缘的菜地、垃圾场、简易窝棚学校，都是度过他们童年的场所，因此北京已经是他们最熟悉的的地方。

这些孩子和第一代移民——他们父母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不仅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

本次调查中 67.2% 的孩子都喜欢北京的生活，理由不外是进步、现代化。“城市的高楼大厦、交通方便及丰裕的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羡慕也都希望毕业后继续在北京上学（38%），留在北京工作（49.3%）。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有一半以上的流动儿童（58.3%）不喜欢、甚至讨厌北京的孩子。理由主要是他们欺负人（26.2%），看不起人（37.1%），同在一个城市生活，有些孩子甚至从来没有和北京孩子接触过（3.1%）。

这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问题，这些流动儿童从小就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排斥以及“二等公民”的不公待遇。如一个学生的问卷里对北京的看法是“到处要钱，赶人，查证”。

随着外地人口流入城市，城乡间的区域壁垒，在流动人口儿童幼稚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稚气的回答道出了一些城乡差距的话题：“北京的孩子吃得好，外地孩子吃得差；北京的孩子穿得好，外地孩子穿得差。”

还有一个小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到北京要办暂住证，而北京人到我们家乡却不需办暂住证？”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却是我们成人都解不开的难题。

如果我们还是继续让这些孩子与北京的孩子分割在两个世界上学，十年以后我们的城里就会出现明显两类人群。要想促进外来人口特别是儿童与本地居民的和谐相处，最好的地

方就是学校，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成为朋友，是保证安全、团结的根本渠道。请倾听一个来自四川的 10 岁女学生赵京梅的期盼：“我很希望和北京的孩子交朋友，跟他们一起学习，一起玩乐，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应该把握这一个共同的机会，相互学习、相互帮忙。”

五、结论：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目前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难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基础教育由县、乡财政管理的教育体制。由于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担，流动儿童少年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所以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而且流入地政府也没有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资金及任务，因此对这些流动儿童少年的入学问题，流入地政府不负主要责任。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外来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为现代化城市盖楼、造桥、修路；他们种菜、卖菜，使得城市的百姓吃上廉价的新鲜蔬菜；他们捡废品、扫大街，使得城市的百姓可以生活在干净、整齐的环境中；他们以辛勤的劳动，低廉的工资，为城市降低了多少财政的支出。因此城市的教育部门不能以“分级办学，分级办理”为由，以财政的原因推卸对外来人口子女上学的责任，应该对他们的子女教育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

此外，外地务工的流动人口在农村交纳了教育附加费，在城市打工也缴纳了工商税、暂住费等一系列的费用。他们负担了城乡的双重费用，但是他们的子女上学，却仍然要另外缴纳高学费而只得到低廉的服务。

义务教育 (Compulsory Education)，是强迫教育也是国民教育，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义务教育也是国家行为，即政府有责任担负起提供有利于儿童入学的各种条件及机会，人民也同时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目前旧体制无法适应新的社会转型时，国家必须主动负担全民义务教育的责任。为流动人口子女创造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不是一个地区的教育部门能够解决的，还涉及到公安、物价、工商、计划生育等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国家不能将流动人口儿童教育的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也不应该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责任推向市场。

如果这些数十万计的孩子不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教育与公平的待遇，不久的将来，在许多城市里，将会出现一支数量庞大的新文盲大军，他们从小在城市边缘生活，是在歧视与排挤中长大的“二等公民”，他们将形成新的严重社会隐患。如何妥善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这已不仅仅是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应共同关注的焦点了。

注释：

①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1997 北京外来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年，第 1 页。

②1997 年底北京市户籍人口数 10,855,492 人，见《北京市年鉴》，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 166 页。

③北京外来务工人员，从事建筑业占外来从业人员总数 27.6%、商业工作人员占 16.28%、餐饮服务工作人员占 12.91%，其他服务业占 14.14%、农林渔牧占 4.06%。同注①第 52 页。

④同注①，第 4—5 页。

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并无限制，50年代中期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城市，因而引发了粮食、副食供应、交通、住房等一连串问题，于是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措施限制农民流入城市。1955年6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经常性的、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1959—1960年由于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中国采取了粮票和副食证的制度，几乎完全制止农民流入城市。

⑥一般用流入地，但对流动人口第一代适用，对第二代无法适用，从本调查中5%的孩子是从小在北京出生的。

⑦此外的儿童是按照联合国《儿童公约》第一条的定义：儿童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这与我国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未成年指18岁以下公民的定义是相符合的。本项调研中的流动儿童是指那些随父母或亲戚离开户籍所在地，或没有现居住地户籍的18岁以下的儿童，最近出现在街头卖花及洗车的流浪儿童（Street Children），不是以家庭为流动单位的儿童群体，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⑧根据中国劳动办开展促进会课题组于1998年9月到1999年4月对114所学校的调查，学校的规模较小平平均每校93人，超过200人的学校只有7所。详见赵树凯：《边缘化的义务教育》，《管理世界》，2000年10月。

⑨黄庄学校、科阳希望学校、辛庄实验学校。

⑩同注①，第174页。

⑪周拥平：《北京市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就学状况分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报》，1998年第二期，第18—23页。

⑫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中、小学统一收费项目、标准卡》，2000年7月。

⑬《暂住人口学龄儿童入学收费知多少》，《北京市儿童发展监测报告汇编》，1998年，第166页。

⑭如电脑多半是一些公立学校或单位淘汰的286或386机，但个别学校也有配置586电脑，并能联网。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邮编：100084）